

近代上海居士組織的佛教文化之傳播

邵捷

上海大學講師

中文摘要

近代以來，上海居士群體處於複雜的時代與環境下，為尋求傳統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的發展與生存，對佛教文化的傳播模式進行了多元化的有益探索，具體舉措包括創辦報刊雜誌、無線電台等媒體機構，開設公益性佛教圖書館，乃至結合素食文化以推廣佛教文化等，試圖為現代社會提供佛化生活的系統解決方案。這些探索與創新不但促進了傳統佛教的現代轉型，同時為人間佛教的理論系統提供了有力詮釋和例證，以及切實可循的參照對象與實現路徑。

關鍵字：居士佛教 佛化生活 傳播媒介



Inspirations of Contemporary Lay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Shanghai: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Culture

Shao Jie
Lecturer,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lay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Shanghai find themselves in a complex era and environment. With regard to transmission modes of Buddhist culture, useful explorations in diversity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find ways for traditional Buddhism to develop and surviv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se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radio stations, and other media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public Buddhist libraries have been set up, and Buddhist culture promoted through vegetarianism. These attempt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solution in leading a Buddhist lifestyl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se explorations and innovations not only promot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Buddhism, but also provide a powerful annotation and example fo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Humanistic Buddhism, as well as a practical reference and realization of the path.

Keywords: Lay Buddhism, buddhist lifestyle, transmission mediums

一、緒論

近代上海佛教的發展，猶如夕陽照映下的晚霞，曾有過那樣短暫而輝煌的一段歷史。相對於僧伽佛教，由在家信眾、團體及其領袖人物所影響及體現的居士佛教運動，對於近代上海佛教的復興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一般而言，居士作為僧團教化、引導的對象，也是僧團生存與發展的依託，近代上海佛教所呈現出的僧伽與居士之間相互補充、卻又相對獨立作用的形態，不僅促進了佛教在特定地域的良性發展，也大為豐富了人間佛教的發展與內涵。考察近代上海居士佛教運動，其組織結構、弘法形式或者慈善事業諸要素，較之以往均有突破與創新之處，特別在佛教文化傳播與推廣方面，所體現出的活潑與進取精神、多姿多采的傳播機制，即使在今日也值得借鑑與思考。本文試圖聚焦這一要素，對近代上海居士佛教的文化傳播模式進行考察，並探索對於今日人間佛教模式的參照與借鑑作用。

可以明確的是，近代上海居士佛教運動的興起，與居士佛教的核心成員以及居士領袖人物的人員構成，有著直接、或者說決定性關係。典型如上海佛教淨業社「三之一亭」¹等居士領袖，或為退任官員，或為工商鉅子，或為仕紳名流，或為大知識分子等，以這些居士領袖的名望、財力、人脈、學識、視野，都不是「以經懺為門庭撐持計者」可比擬的。因此他們對於佛法的弘揚、佛教的推廣、佛教文化的傳播，都有著自己的思考與探索，甚至表現出某種程度的超越性。也只有這樣一批大居士，才能調動相應社會資源，構築起複雜而成熟的佛教組織，他們對於佛教文化傳播的模式創新，甚至為今人所不能比擬。上海居士佛教事業的開展雖以因人成事為動因，但也須依託於各類佛教居士組織。按近代上海佛教的居士組織類型，大致分為傳統結社、

1. 「三之一亭」指關絅之、施省之、黃涵之和王一亭。



佛學研究、大型社團三類，²其數量難以精確統計。其中佼佼者，當屬上海佛教居士林，包括由其改組而來的上海佛教淨業社和世界佛教居士林。如逐一考察又恐過於龐雜繁瑣，因此以對其傳播模式與媒介類型的考察為主要分析，或可收管中窺豹之作用。

二、帶動佛教發展的佛教報紙

現代意義的媒介指傳播資訊的介質，大眾傳播學中將紙質媒介的報紙刊物定義為第一媒體，廣播為第二媒體。與此定義契合的是，近代上海居士佛教的文化傳播，極為重視這兩種大眾媒介。1929年，由「三之一亭」中的王一亭、以及李經緯等人發起創辦的上海佛學書局，是中國近代以來較為著名的一所編輯、刻印、流通佛學典籍的出版機構，有「全國弘法之唯一機關」之譽。上海佛學書局初設寶山路，後遷膠州路7號；1956年與大法輪書局、弘化社改組合併為上海佛教書店；1991年恢復上海佛學書局，地址設於常德路418號。其中上海佛學書局即主辦有佛教報紙《佛教新聞》和佛教期刊《佛學半月刊》。

從當時《佛教新聞》版面內容來看（圖1），³在第一版即有上海佛學書局所撰〈介紹佛教新聞啟事〉云：「係聯絡各國佛教徒之有力刊物。內容豐富，以提倡佛學，宏揚佛法，報告各方佛教



圖1：佛教新聞

2. 唐忠毛：《中國佛教近代轉型的社會之維：民國上海居士佛教組織與慈善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02-103。

3. 圖1：《佛教新聞》第38號第一版，1937年3月9日星期二。

新聞為宗旨。」明確闡述了辦報宗旨。《佛教新聞》內容豐富，大致劃分為七個版塊：一為新聞及社論，為該報主要內容；二為講經通告；三為法師講法及居士演講和書序；四為佛學類文章摘錄；五為著名寺廟叢林介紹；六為佛學名詞釋義；七為廣告，基本與佛教相關，如佛教書籍、香燭及素食等。《佛教新聞》報名由葉恭綽題寫，報社地址分業務、編輯、發行三處。業務部：上海哈同路八十七號；編輯部：寧波路阜安里廿二號；發行部：上海赫德路四一八號。《佛教新聞》有七大訂報處，上海本埠三處，外埠杭州、長沙、福州、北平各一處，分別為：上海愚園路佛學書局、上海閘北新民路佛學書局、上海霞飛路道德書局、杭州龍翔橋佛學書局、長沙玉泉街佛學書局、福州下南路佛學書局、北平四牌樓佛學書局。在功能分布、市場行銷等經營方式上，已與現代企業制度無異。

前文所述「改組合併」中的另一著名佛教出版機構弘化社，於1930年在上海覺園淨業社成立。1930年印光大師赴報國寺閉關，行前與王一亭、黃涵之、關綱之諸居士商議成立佛教淨業社流通部，由明道法師籌設，後業務擴大，遂更名為弘化社。1941年，佛教四眾弟子在淨業社成立印光大師永久紀念會，同時出版《弘化月刊》，後演化至今，即為現江蘇省佛教協會會刊《弘化》。大法輪書局則是在1940年由上海陳法香籌辦成立，並編輯出版《覺有情》半月刊。1946年又有上海佛教青年會公推陳海量居士創辦大雄書局，以及佛教青年會會刊《覺訊》等。按當時上海居士所創辦的佛教出版機構、刊物、報紙等媒介，有不下數十種之多，此處僅稍列舉較為知名之典型。

三、結合電子科技的佛音電台

1922年，上海佛教淨業社遷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創始人簡照南府邸——覺園之時，覺園中原有為公司宣傳所架設的電台，佛教淨業社入駐後，藉由



之前的基礎，誕生了以「傳播福音，弘揚佛法」為宗旨的佛音電台。

佛音電台由李荋侯擔任主任，因信眾捐贈富足，不像其他電台必須通過廣告等形式換取維持運營的資金，所以早期播送節目內容簡潔明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佛法宣傳：⁴一為定時播音，引導信眾誦經念佛，養成每日早晚功課習慣，對佛經進行必要的基礎講解，以加深信眾對佛法的理解。其二，在佛教淨業社請高僧來現場開堂布法，通過播音形式讓更多信眾聆聽教導，宣揚佛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請錫蘭（今斯里蘭卡）納囉達法師前來布法，每日上午在覺園內佛音廣播電台用英語播講佛學，下午演講南傳佛教，為信眾講授巴利文。第三，通過佛音電台，向信眾公布法會資訊，組織信眾參與。除以上三點，每有重要法會、佛事進行，佛音電台亦會組織慈善募捐，為各信眾積福納德。憑藉傳經法會等活動不斷積累的人氣，佛音電台逐漸嶄露頭角，成為小有名氣的公益性電台，節目內容也不時會增加對國學的宣講，從這點也可看出佛音電台重視民族精神的傳承。

從文獻記載來看，自 1935 年至 1937 年間，佛音電台已在國內外具備相當影響力。其中最具標誌性事件有三：其一，佛音電台與當時中國紅十字會有較為緊密的連繫，在紅十字會第二次徵求會員大會期間，電台先後六次推送特別節目為其造勢。1935 年 9 月，佛音電台更盡全力協助紅十字會總會為水災播音募捐。其二，1936 年進行禁菸拒毒的演講播音，邀請新潮音樂社、華光樂會、鳳社、中央銀行同人俱樂部進行輪流表演，並有社會名流進行講演。其三，淞滬會戰期間，佛音電台配合上海慈善團體以及救災會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多日連續廣播，為戰區難民發布尋人啟事消息，使離散人民得以團聚；隨後與上海輔仁堂、伶界聯合會國難後援會等聯合播音，募集善款

4. 刁青雲：〈佛音電台〉，《上海佛教》2016 年第 5 期，上海：上海市佛教協會，頁 14-15。

救濟難民，期間梅蘭芳等親自至電台播音演出。隨著中日戰況不斷升高，電台經營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1938年3月，日軍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哈同大樓內設立「上海市廣播無線電監督處」，主管廣播電台指導與查禁事務。佛音電台播送節目內容遂受限，並受到衝擊。最終日軍直接禁止佛音在內的六家電台播音，至此佛音電台方始消失。

以當時社會的科技水準，使用電台傳播佛法，不啻今日之互聯網、視頻直播、微信自媒體等，是相當先進和新潮的傳播手法，它不僅是一種生動有效的弘法方式，而且對打破社會固有成見、樹立佛教生機活潑的良好形象，有著非常正面的作用，上海佛教居士界的胸襟格局與文化視野，也於此可見一斑。

縱觀佛音電台經營歲月，從其創立之初到後期播音內容不斷充實豐富，雖不免受時政影響，但總的來說始終沒有背離它設立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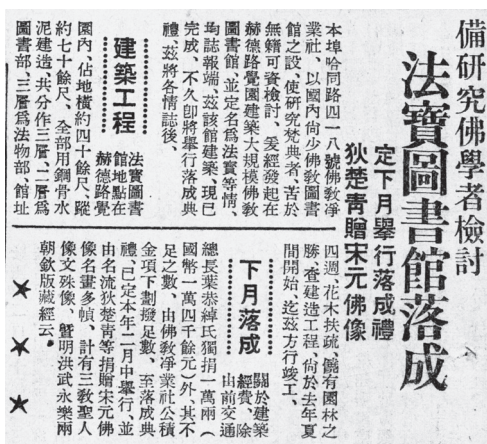
四、搶救古籍的法寶圖書館

傳統七堂伽藍制佛教寺院，多設立藏經樓，用於收藏、供奉佛教典籍。事實上這些典籍在絕大部分時間裡束之高閣，很少對人開放——即使是對寺院內部。傳統農業社會中印刷業尚不發達，為保護珍貴的佛經版本，這樣的措施可以理解。但進入現代社會之後再這樣封閉保守，實際上已對佛法的傳播構成阻礙，這種文化藩籬亟需打破。

有鑑於此，世界佛教居士林 1922 年成立後，即設有圖書室供林友閱覽，1924 年又改稱圖書館，孫制衡任主任。其後圖書館建築不斷擴充，收藏圖書、典籍更為豐富。另 1932 年上海佛學書局也在書局內開設了一所佛學流通圖書館，方便信仰佛教者閱讀經典。1940 年創辦大法輪書局的陳法香，也同時創辦大法輪圖書館，定期供信眾閱覽和借閱。



至於對社會影響最大、貢獻最高的佛教圖書館，還屬上海佛教淨業社創辦的法寶圖書館。1937年2月，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佛教淨業社社員葉恭綽，捐助白銀10000兩（合法幣14000元）建造法寶圖書館（見右圖）。⁵法寶館後設址於覺園南部，由葉恭綽主持，專事影印藏經、收藏佛教文物。法寶館共分三層，二層為圖書部，三層為法物部，收藏各種版本的佛經和宋、元名畫及佛像，明代南北兩藏及古代法器等。



在法寶館籌建之初，葉恭綽致信好友、著名書畫家兼收藏家吳湖帆，懇請代刻「法寶館章」、「法寶館收藏經典法物之印記」印章兩枚。館既落成，1937年10月，葉恭綽又自北平柏林寺請來清刻《大藏經》一部並親自送至館中收藏。法寶館建成之初，除收有大量佛教經典書籍外，還得到狄楚青等社會名流捐贈的宋、元、明、清珍貴佛像及法物等入藏。1937年6月，上海市博物館及上海市通志館聯合各地收藏家發起上海市文獻博覽會，向各寺廟佛學圖書館亟求文獻會函、佛像法物，法寶館新入館的珍貴佛像便在邀請徵集之列。至1944年，時任法寶館董事長的葉恭綽又將私人佛教文物捐至法寶館中，充實館藏。法寶館之館址場地不僅為「法寶」提供貯藏之所，亦為佛僧行善的場所。如1939年成立的上海佛教同仁會便將會址設於法寶館之中，該慈善組織由胡松年、樂慧斌等人發起，並得到印光大師贊助。佛教同仁會旨在為來滬的貧窮僧尼和有志於弘揚佛法的僧尼提供經費。後隨著形勢發展

5. 圖2：《申報》，1937年1月9日第4張第16版：法寶圖書館落成。

的需要，法寶館成為戰時的上海佛教僧侶居士及圖書文物的重要庇護之地。

1937年江南各省相繼淪陷後，各地藏書家迫於兵戈擾攘而將所藏珍本古籍拋向舊書市場，多被日寇和漢奸搶購並流向海外。戰事之中，著名文人鄭振鐸等人聯名向重慶當局呼籲「收異書於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於秦火魯壁之際」，要求撥款搶救民族史料及文獻古籍。當局以「籌集鉅款深感不易」敷衍，但在鄭振鐸等人力爭及葉恭綽支持下，當局同意從「中英庚款董事會」（時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撥款，搶救、收購民族文獻，隨即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孤島」，搶救文獻的工作才被迫停止。這些被搶救下來的古籍陸續由專人裝箱攜至重慶及香港，未及運走的大部分珍貴古籍正是存放於覺園法寶館內。直至1960年，葉恭綽將法寶館房屋、圖書文物及私人藏品共同捐獻至上海文物局，其中共計圖書33585冊、文物304件，大部分轉交上海圖書館保存。緣起法寶、緣歸法寶，法寶館與歷代佛法史學「法寶」的因緣跨越近一個世紀。

佛教圖書館的功能，實質是將傳統佛教寺院中的藏經閣，開放至社會大眾使用，它對佛法的傳播與放大作用，遠遠超越了後者。以法寶圖書館為代表的上海佛教圖書機構，在戰爭頻仍的年月，滿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精髓，肩負傳播佛法、保護文物、守護文明等眾多歷史使命，是以上海佛教居士為主要力量推動下結出的善果。回眸歷史，居士佛教組織所承載與未來可能承載的社會功能，值得後人注目與思索。

五、文化傳播的多元路徑——功德林素食

人間佛教的觀念，較為重視佛教文化對日常生活的介入，即佛化生活，而日常生活的基本層面在於衣食住行。佛教對於飲食的態度，一向以素食為指歸，對於素食文化的推廣與發掘，是佛教界應有之義務。當時滬上名剎各



有自己的素食招牌，而居士佛教對於素食推廣的努力，以上海功德林最見卓效。

功德林全稱「上海功德林衛生蔬食館」，其創辦的初衷除戒殺茹素、積累功德之外，也有現代衛生的考慮。創辦者除經理趙雲韶外，包括王一亭、程雪樓、李雲書、關綱之、簡玉階、江味農、狄楚青等紳商名流提倡與入股。功德林除在素食餐飲上吸引顧客，另一創辦特色還在於對佛教文化的推廣。從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到上海佛學書局、再到上海功德林，這些佛教機構和佛化商品，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各個維度分別滿足了不同信眾的信仰需求；對比傳統的寺院齋堂，功德林為信眾茹素、聚會乃至宗教修行提供了更為現代化的空間，這些舉措可以說真正做到了佛化生活。

功德林創立之初由江味農負責，設有佛經流通處。至 1930 年，功德林出版或代理流通近千種佛經，並為當時剛成立的上海佛學書局批發經典，同時也出版黃涵之《初機淨業指南》、《威音》雜誌等現代佛學書報。除流通佛經外，功德林也兼售或代售名香、淨素肥皂、味精等生活用品。如游有維所言，流通處是「以提倡蔬食的因緣來推廣佛教，同時又以宣傳佛教的教義來提倡素食」。⁶

功德林除佛經流通處外，還時常舉辦佛教活動。例如 1923 年，功德林舉行佛誕紀念會籌備宴會，擬請政府通令全國各省禁止屠宰茹素三日或一日、同時停止刑戮。同年，功德林還為錢化佛舉辦佛畫展覽會。1927 年北伐戰爭期間，王一亭等人登報號召民眾前往上海佛教淨業社、世界佛教居士林和功德林三處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七天，以此化劫消災。除這些臨時性活動外，功德林常年邀請高僧大德前來講經說法。1931 年日寇侵華，王一亭、朱子橋等

6. 游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112。

人發起仁王護國法會，邀請持松法師講解《仁王護國經》。從這些活動來看，功德林似乎與居士林有不少功能上的重疊，但這些講演的實際舉行時間都在晚餐前後，又似乎有些類似於寺院齋堂用齋前後的開示。以靜權法師講《地藏本願經》為例，整個講經活動就是在晚間 8:00 開始。據《申報》（1926 年 12 月 24 日）報導，⁷當時功德林為方便前來聽經的 300 餘位信眾聽經和就餐，每天還特地準備僅需 0.4 元一份的便餐。顯然，除以精緻的素菜款待所邀請的高僧大德外，功德林希望不但社會中上層的信徒可以光臨，同時也希望以相對廉價的飯菜吸引一般信眾參與這些佛教活動，或許這就是一種「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的方便。

功德林寓弘法於商業的模式，正如後來的上海佛學書局一樣，一直獲得很好的成效，成為佛教文化涉足餐飲界的典範。所謂「佛法不離世間覺」，功德林的成功，便昭示出此言的深刻意涵。

六、結語

上海近代以來以華洋薈萃、環境複雜而聞名，駁雜的文化在此相互碰撞和交融，在此複雜環境中的佛教文化如何發展與傳播，特別具有考察意義。居士佛教在近代上海佛教界的影響，更多體現在眾多居士組織的出現和運轉，他們不僅為中國近代佛教在義理研究和傳播上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在慈善、公益，乃至救亡圖存的入世事業中奉獻力量。在特定歷史背景與文化因素之下，上海佛教居士群體出於強烈的宗教情感而創建的多種佛教文化機構，在為趣往彼岸而集聚資糧的同時，不忘入世之救度，故又有種種方便之舉，對佛教文化的傳播模式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與創新。

7. 張佳：〈上海功德林興起始末〉，《上海佛教》2016 年第 6 期，上海：上海市佛教協會，頁 17。



所謂「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考察近代上海居士組織對佛教文化傳播的種種舉措，特別令人稱道之處是其傳播方式與平台的系統化，從第一媒體的出版印刷，到第二媒體的無線電台，以及圖書館、素食館等舉措，基本對時代環境所能允許的方式進行了全譜系覆蓋；相對於外部世俗世界，構建起一個平行維度的佛化世界，對當時上海這個摩登社會的市民生活提供了一個系統的佛化生活方案，並產生著良好的適應。而上海居士群體所創辦的主要佛教文化機構，其組織嚴密、制度完善、運轉有效，在經營策略上既考慮一定的經濟收益，又牢牢秉持「普度眾生、有教無類」的佛陀本懷，從而摒棄了過度商業化的隱患與過失；即使涉及一些技術、方法，亦非盲目追逐潮流的標新立異之舉，所謂什麼新鮮來什麼，而是切實收到了良好的社會實效，這樣的探索無疑是頗為成功的。

更可貴的是，上海居士群體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將佛教文化的傳播與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結合起來，主動地吸收現代社會的成熟模式及文明成果，進而演化為佛教文化的現代性，有力證明了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高度融合的可能性，進而證明了佛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這可以視為近代上海居士佛教最大的實踐成果，對於今天的上海佛教仍然是可資借鑑與繼承的。

參考書目

1. 唐忠毛：《中國佛教近代轉型的社會之維：民國上海居士佛教組織與慈善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2. 游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 年。
3. 孟令兵：《老上海文化奇葩——上海佛學書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4. 麻天祥：《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劉成有：《近現代居士佛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6. 尋紅霞：《上海的佛教組織——世界佛教居士林研究》，上海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5 年。



五乘佛法以人天乘為基礎，
能夠把「人」做好，
進而發「菩提心」、實踐「菩薩道」，
如此才能完成「佛道」。
佛教是五乘共有的真理，
它不光是出家人所特有的修行準則，
更是世間大眾共有的人生指南。
佛教最終的目標就是要淨化世道人心，
使眾生有所依歸，因此佛教應該普遍化於每個家庭，
為每個人所接受。

～《人間佛教語錄》